

深读·封面故事

网络“谋杀”教授

(上接B01版)

谁惹了谁?

3月1日,郭定平之死在网上出现第二个版本:

“复旦大学教授郭定平在车内离奇死亡,车身外有被砖头之类砸打痕迹,身边有一盒‘补心口服液’,警方已介入调查,调查结果系自杀。”

简短有力,却不乏戏剧性。这次,“自杀”消息直接被冠以“上海媒体的口吻发出,几欲乱真。”

“我的同事,还有我女儿一看到这些就知道是假的。”郭有些恼怒,但保持了克制。

不过没看到有分量的辟谣,一些不明真相的复旦学子开始缅怀起这位被戏称为“GDP”的老师,称他为人和善,对留日期间的导师非常尊重,近似鲁迅之于藤野先生,最近还为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担忧,斯人已去委实可惜。有老复旦人则直接穿了原帖中的漏洞,认为在复旦大学跳楼的人很少会去行政楼,至少也是选择在文科楼,这不合传统,编造的痕迹有些明显,继而有人联想到历年来的自杀大合集,这些情节无非是其节选,十有八九属于虚乌有。

再回看郭在凤凰卫视连线时的情景。

2月23日,郭正襟危坐,当主持人向他征询对孙海英夫妇申请欲将户籍迁往钓鱼岛一事看法时,他先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接着说:“我个人认为在中日有争议的岛屿上,迁入中国公民的户籍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像这种迁入可能会导致新的麻烦,而且为未来中日谈判钓鱼岛问题设置新的障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奉劝我们国人,我们的中国公民,不要在这些问题上有过激的行为,我也认为中国政府不会支持,鼓励和放纵这种行为。”

“他是很理性地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复旦大学一宣传部门的人员事后在微博上感慨:“我们的大部分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很顶真。面对圈套和陷阱,往往很认真地扮演了反面角色,不肯流俗地逞口舌之快或哗众取宠。面对已高度娱乐化的媒体,你不娱人,人便娱你。”

节目一经播出,曾被某网站票选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的孙锡良就忍无可忍,“想不说几句是不行的”,随即在2月26日发出长文《郭定平折射出复旦和中国学界的局部问题》,直接批评说:“正如郭教授批评孙海英有言论自由但不能给国家增加麻烦的逻辑一样,我也认为,郭定平有在电视发表言论的权利,但是,你真的不要给复旦和中国学界丢脸,真的不要让中国国际问题专家蒙羞。”

郭迅速背负了各种骂名,并在浩浩荡荡的网络审判之后,接连遭遇两次“被自杀”。

“不会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孙海英也没想到自己发出的一条微博能招来一场血雨腥风,搅动整个网络不得安宁。“再说这迁户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孙海英说,虽然他还是认为,“就你们(日本人)能迁,我们不能迁,凭什么呀?”

自然,孙海英也未曾在这场闹剧中说出“为郭向主祷告”这样意味深长的台词。

“都是假的。”郭说他欢迎批评,只要是冷静的学术讨论。一直以来,他认为中日之间要维护战略互惠的关系,但并不曾在自己

书中提到为了中日友好,可以将钓鱼岛归日本所有。

郭实在很忙,他没有精力为这些口水劳神,不过在面对台下的学生轻松讲完开场白后,“复活”的他突然觉得这事儿也有些意思,“很值得研究一下”。

学者的“屁股”该往哪坐

放在往常,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郭碰到过的人身攻击多了,“有些攻击污蔑谩骂批评,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似乎是这个领域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便是纯学术研究,但接触到一些敏感话题时,很容易刺激起一些人的强烈情绪。

有学生觉得郭很冤,“这次被激动的网上愤青们扣错帽子了。”还有学生则一板一眼地去分析网民为何如此愤怒,非要“戮之而后快”。

网友“sickles”说郭的观点并无甚不妥,没有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便最后被演变成了“主张中国将钓鱼岛送给日本”依然不是大众愤怒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从去年9月份中国渔船被日本扣押以来,大众的反日情绪迅速酝酿,但却没有发泄的出口,郭很偶然地被充当了替罪羊。

知名学者吴稼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比如近来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就触动了一些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敏感神经,进而以郭的言论作为发泄口。他认为领土问题等国际战略考量是个艰难和困难的领域,国际战略需要有连续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吴稼祥认为“郭定平事件”中

掺杂了爱国主义的情绪,“每个中国人对发达国家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去得了那些国家的就爱,去不了的就恨,爱国主义中大部分是去不了的。”对于这些人,他认为他们不接受非情感的立场,没有中性立场,非爱即恨,没有选择,“既然从郭教授的言语中看不出他恨日本,那他他就是爱日本,他们就要恨他。”

这种“极端的情绪”被他看做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倾向于怀念过去,怀念朝贡体系下的传统中国,而其中的愤青则是“那些已经被这个社会边缘化和正在或将要被边缘化的人”,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寄生体,于是往往就选择了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

郭定平最终选择了报警。不过,关于他“自杀”的消息仍然像他不停息的生活一样在网络里疯传。

这场“血腥的娱乐”在掀起高潮后会稍歇,之后或许再进入下一个循环。

“投票的公民多了,网络愤青也就少了。”吴稼祥如此希冀。

对话郭定平:

民族情绪是自然发生的

本报记者 龚海

3月2日,记者在复旦大学就中日关系问题与郭定平进行了一场对话。

“中日只能选择竞争与合作”

齐鲁晚报:最近一段时间,比如日俄北方四岛争端发生以后,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像钓鱼岛问题,再次触动了国内不少人的情绪,对此您如何看待?

郭定平:这首先得从中日两国现在的发展格局来看。尽管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但日本的经济总量庞大,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经济、科技,还有我特别想要强调的,它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优势依然非常明显,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优势。

现在,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在整个东亚地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同时并存的局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兵戎相见肯定是我们不愿见到的,两强相争两败俱伤。那么,我们只有选择竞争与合作的道路,而这就是我所说的迎接中日强强竞争的新时代。

齐鲁晚报:提出“强强竞争”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哪里?

郭定平: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背景,我们就要小心地处理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仅有钓鱼岛等历史问题,还有经济摩擦问题,有相互间的民众感情不友善的问

题,也有军事上的不信任,政治上的不信任,甚至相互猜忌的问题等等。

所以我们要综合地、理性地、科学地看待中日之间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视野,把握住中日关系的大局,即我们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就是中日关系的大局。

“钓鱼岛问题不宜大力刺激”

齐鲁晚报:中日关系的大局得到认可,但仍有不少不利因素。

郭定平:是的,目前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面临一系列冲击,需要特别注意。其一,比如有来自美国的唆使和挑衅,因为美国要维护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他拉拢日本,甚至威胁利用日本。所以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面临很多因素,其中美国就很关键。

其二,同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崛起让两国的综合国力发生微妙的变化,而日本过去是有优势的,且长期对中国有优越感,所以日本国民、日本领导人对此表现得非常敏感,甚至有时神经紧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能刺激日本国民,使其进一步向民族主义的、对华敌视的方向发展。

其三,日本国内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日本国内政治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感觉,所以他们对民意,对

民众脆弱的神经保持高度敏感,因而在对华问题上、对韩问题上以及对俄罗斯问题上,一直非常高调。

齐鲁晚报:那中国应该怎么做?

郭定平: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客观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几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像对钓鱼岛这样的历史问题,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更冷静的思考,更成熟的战略,不宜草率从事,不宜大力刺激。

齐鲁晚报:那如何处理中日之间的矛盾摩擦?

郭定平:中日之间的矛盾摩擦肯定还有,毕竟2000多年了,存在那么多问题,短期内能一下子解决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如何在发展中日互惠关系的基础上,把那些问题控制在比较低的层次,比较小的范围。

“民族情绪也会被政治利用”

齐鲁晚报:你如何看待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郭定平:不支持,不赞成,坚决反对。但是作为情绪,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需要日本的媒体、日本学者、日本政府正确引导,因为他们说他们是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强行控制,因此就需要有效去引导。这也需要我们中日之间的交流,政府间的交流,学界的交流,民众的交流,这种

交流增加了有效了,就会把日本的这种民间情绪、民间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引导。所以,这个问题从始发来说在日本方面,但是做工作是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齐鲁晚报: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也被政治利用?

郭定平:是的。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家为了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就会制造一些事端。有些时候他们不敢碰触这些敏感的神经,因为如果在谈判或表态中稍有不慎,他的支持率就会下降。

齐鲁晚报:你如何看待一些在中日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

郭定平: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倾向,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去引导。

齐鲁晚报: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中国学者,您如何进行角色定位?

郭定平:加强对日本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日本,对日本的情况有准确的把握,然后做讲演、写文章、出版书籍,使更多的人对日本、对日本问题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推动中日之间各层次间的交流。

